

“一杯茶”调解工作法的文化治理逻辑

刘继峰

特色的治理路径。通过伦理规范的柔性动员、文化符号的转译建构与公共空间的活化利用,激活文化基因的内生治理动能,厚植文化底蕴、增进人文关怀,寻求“低制度成本-高社会认同”的社会治理创新之道。

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向

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完成从“文化基因”向“治理工具”的现代跃迁。这一过程既非简单“文化复古”,亦非机械“传统嫁接”,本质上是历史积淀的文化基因解码,重构为适配现代治理需求的制度工具与技术手段,在文化主体性自觉与治理现代化诉求的双重驱动下,推动“价值嵌入-功能嵌入-结构嵌入”,实现治理资源的再生性激活。

从价值层面看,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独特载体,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伦理道德、处世哲学与待客之道。临涣古镇不产茶,却有“棒棒茶”化民成俗的悠久传统。“一杯茶”调解工作法,挖掘“茶为媒、礼为先、让为敬、和为贵”的“和合”文化精神内核,赋予“以茶为媒”“摆茶评理”深厚文化内涵和新时代意义。从功能层面看,作为“一杯茶”调解工作法的核心场域,当茶馆作为非官方的协商空间被赋予调解功能时,其氛围对当事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便从日常社交空间转变为现代治理场域,传递着调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从结构嵌入看,“一杯茶”调解工作法注重加强党建引领和组织嵌入,整合了乡贤、老党员、老教师、退役军人等社会力量,组建了“老支书团队”“兵哥团队”“乡村小喇叭团队”等志愿者团队,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调解方式相互衔接,形成了一个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调解网络。

可以说,“一杯茶”调解工作法根植于皖北地域性文化特质,实现了民俗延续与功能拓展,是典型的地域性文化基因解码。其以茶礼程序为表,伦理规范为里,公共空间为介,构成独特的符号系统,构建起对话协商机制,衍生出“敬茶明序、续茶析理、立约止争”的价值准则,形成兼具历史绵延性与治理功能性的文化实践范式,使“茶礼议事”的文化

传统焕发新活力。

以柔性善治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本质是通过文化浸润与价值共识凝聚社会成员,构建情感共振与文化符号耦合赋能的柔性治理模式。柔性善治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维系纽带,必须通过文化认同凝聚治理共识,以情感联结修复社会关系,以制度协同提升治理效能,以多元共治重构治理生态。

“七步调解”是“一杯茶”调解工作法的核心。“以茶暖人心-以茶说人生-以茶述纷争-以茶找支点-以茶拆面子-以茶置梯子-以茶达成协议”是一套系统化的矛盾纠纷调解流程,涵盖了受理纠纷、调查了解、沟通协调、协商调解、签订协议、回访落实和归档总结七个步骤。“说人生”“拆面子”等环节,根植于乡风民俗中特有的“面子观”“人情观”,赋予调解过程庄重感与亲和力,沟通中突出人心融合、文化熏陶,塑造文化共识,通过情感共鸣重塑当事人关系,以共情消解对立,让纠纷解决回归“熟人社会”的伦理框架,促成情感治理与关系修复,实现程序正义的柔性化调适与制度化形塑。通过明确的步骤和规范的操作,确保调解过程有条不紊,有助于全面了解纠纷的起因和双方诉求,从而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的调解方案。解决了现代法律刚性裁决后“案结事不了”的情感遗留问题,实现了情理法的统一。

“一杯茶”调解工作法推广实践中,地方党委和政府因地制宜、因势而新,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整合社会力量,搭建多元平台,推动公检法司、组宣统战、社工群团等多部门联动,努力促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在工作模式的融合推广中,注重强化品牌矩阵与跨界应用,衍生开拓“移动茶馆”“茶馆+”“一杯茶+”等新模式,在推动与理论宣讲、红色文化、乡村振兴、营商环境、文旅融合等深度磨合结合上下功夫,不断擦亮“北有一杯茶”的品牌底色。

(作者单位:淮北市党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其中,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有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的重要举措。

有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必要性

满足基层群众文化需求。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发展不够均衡,一些地区基层文化设施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如图书馆藏书数量稀少且更新滞后,难以提供前沿知识和多样化的阅读选择;文化馆场地狭小、设备落后,无法满足专业化和多样化的文化活动需求。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基层群众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愈发强烈,渴望享受到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前沿的文化讲座、精彩的艺术展览等优质文化资源。因此,优化基层文化资源配置,有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成为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迫切任务。

缩小城乡文化差距。城市凭借其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资金、人才、项目等。城市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化场馆建设不断完善,涵盖艺术、历史、科技等多个领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空间。相比之下,农村基层文化发展因资金投入不足、人才匮乏等因素的制约,滞后于城市。因此,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特别是农村的机制,对于缩小城乡文化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优化国家建设的整体布局。基层是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只有基层文化繁荣发展,才能筑牢国家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民俗技艺、传统戏曲在基层重焕生机,还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文化人、以德润心,增强基层群众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当基层文化充满活力,全民文化自信得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将随之增强。因此,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既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支撑。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系统构成

核心机制。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核心在于实现供需互动。核心机制的组成:一是资源下沉机制,将优质的文化资源输送到基层;二是需求上达机制,精准把握民众的文化需求;三是动态平衡机制,优质文化资源供给与民众文化需求相对接。机制之间相互协同,共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在基层的高效配置与精准对接。

辅助机制。辅助机制是确保核心机制良好运行的重要支撑。具体而言,数智赋能机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文化资源供给的精准性和效率;激励保障机制,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等措施发挥驱动作用;辅助机制相互配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供支持,推动文化资源供给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机制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有机整体,不同机制在不同层次和侧面上相互呼应、互为补充,共同为机制的有效性发挥作用。

有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实现路径

强化政策扶持引导。首先,制定专项政策,细化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措施。其次,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活动的开展,对积极参与基层文化建设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给予资金补贴与税收优惠。此外,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农村、偏远地区倾斜,鼓励文化机构与基层结对帮扶。

整合多元文化资源。首先,整合公共文化机构资源,通过馆际合作,推动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等实现资源共享,以巡回展览、数字资源共享等形式,将丰富的馆藏资源与优质展览资源输送到基层。其次,充分挖掘社会文化资源,发挥文艺团体、文化企业等社会力量,鼓励其创作贴近生活实际的文化产品。同时,组织文艺下乡演出、文化产品展销等活动,将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直接输送到基层,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培养基层文化人才。首先,实施文化人才定向培养计划,依托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文化管理、文艺创作等相关专业,为基层输送具备专业素质的文化人才,满足基层文化建设的专业化需求。其次,定期组织基层文化工作者培训,邀请文化领域专家开展专题讲座与实践指导,提升其业务能力与创新意识,增强基层文化服务的专业水平与活力。最后,加强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广泛招募文化志愿者,鼓励文艺爱好者、退休文化工作者等参与基层文化服务。同时,对文化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提升其文化服务能力。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首先,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整合各类文化资源,构建智能化资源管理与分发系统。通过分析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偏好,实现文化内容的精准推送。其次,充分利用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实时转播文化演出、培训课程等活动,突破传统文化服务的时空限制。此外,建设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集资源查询、活动预约、在线学习、互动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实现线上线下文化服务的无缝衔接,让民众享受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4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安徽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实践路径研究”成果】

有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徐彤

厚植文化根基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瞿红霞

义先进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萃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精华,并立足于中国实际,吸收了国外文化有益成果。其具有植根社会实践、紧跟时代前沿、为人民服务、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内在属性,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理念与创新方法。例如,许多城市利用大数据分析交通流量,优化信号灯设置,缓解交通拥堵。这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

多措并举:夯实社会治理文化根基的路径

依托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筑牢社会治理文化基石。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是传播各类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夯实社会治理文化根基的前沿阵地。一是推动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奠定文化传播基础。坚持因地制宜、重点突出、集约高效、文化传承的原则,进行全面整体规划和提档升级。二是创新活动方式,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为依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社会治理注入活力。例如,滁州市南谯区章广镇鸭窝村将优秀文化以“说书”形式进行传播,让传播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引导群众向善向好。

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培育社会治理文化使者。文化人才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创新者,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一是精准引进文化人才。制定引进计划,通过招聘会、人才交流会、就业见习等方式引进专业人才,

有效缓解基层文化人才匮乏状况。二是深度挖掘基层文化人才。举办各类文化艺术比赛、展览、实地调研等活动,发掘民间手工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等潜在文化能人、草根艺人,引导其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三是加强教育培训。组织专业技能培训班、学术交流、“传帮带”等活动,提升文化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和能力,打造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四是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人才考核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落实各类人才政策,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确保人才引得进、育得好、留得住,为社会治理提供稳定而持久的人才支持。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开创社会治理文化新局。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为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带来了新契机。一是创新优秀文化展示方式。例如,在革命纪念馆中设置数字化互动展区,通过多媒体展示革命历史场景,不仅让群众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岁月,也让优秀文化在“润物细无声”中入脑入心,推动红色基因传承,激发社会治理中的奋斗精神。二是推进“云端”场馆建设。例如,打造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等“云端”场馆,将古籍、文化典籍等数字化,打破时空限制,传承文化经典,为社会治理提供正确价值导向,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滁州市委党校)

固本培元:探寻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之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社会治理的思想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沉淀,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是社会治理文化根基的深厚源泉。例如,儒家倡导“仁政”与“德治”。在当前社会治理中,很多地方评选道德模范、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榜样带动群众提升道德素养,营造和谐社会氛围,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道家的“无为而治”并非消极不为,而是主张遵循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不过度干预,为当前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全面激发社会活力提供有益启示。

革命文化:激发社会治理的精神动力。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社会治理注入强大精神动力。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英勇无畏、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激励着当前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勇于担当、善于作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赋予社会治理时代内涵。社会主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徽州文化的当代价值

王越

徽州文化源起于两宋,流变于元代,全盛于明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存的代表之一。徽州文化涵盖了宗法伦常、学术源流、商业贸易等关乎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深刻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地方社会各方面的基本内容,被誉为传统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了解徽州文化产生的深刻背景,厘清徽州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剖析徽州文化流变过程中的历史特征,有利于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展现徽风皖韵独特魅力,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徽州文化力量。

有利于推动安徽文化发展,提升安徽文化软实力

徽州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徽州文化具有连续性;徽州家谱编写秉持着“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十年小修,三十年大修”的理念与原则,使得徽州文化得以绵延不绝,连续传承了下来。徽州文化具有创新性;这集中体现在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在中国十大商帮中独树一帜。徽州文化具有统一性;表现在徽州文化的家国情怀上,徽州文书中不乏对“家国同构”的表述。于内,“汪华信仰”蕴含着保障乡里维护统一的意愿;于外,徽州文化滋养出了诸如胡宗宪、汪道昆等抵御外侮的英雄人物。徽州文化具有包容性;深刻体现在学术思想的包容性上。徽州作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在学术史上经历过“一以朱子为宗”的阶段,但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徽州学术也做到了兼收“湛、王”之学,并将之运用于明清徽州乡约的编写中。徽州文化具有和平性;讲信睦睦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元素,这体现在徽州契约文书的编修上,徽州契约文书跨越千年,包含商业、

农业、民事、禁约等方面,体现出徽州文化崇尚契约、爱好和平的底色。对这些重要元素的挖掘和理解,有助于加深对徽州文化与中华文明联系的认识,把握徽州文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徽州文化力量。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徽州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样本,其当代价值不仅在于文化基因的赓续传承,更在于为解码“第二个结合”提供鲜活注脚,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实践智慧。新安理学构建的“理气合一”哲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形成跨时空对话。朱熹“理在气先”的本体论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戴震“气化即道”的实践论强调知行合一的现实观,这种既重形而上思辨又重形而下实践的思维特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性和实践性的特征相呼应。

当代徽州文化研究需要超越地域文化视角,立足“第二个结合”的战略高度。从新安医学“治未病”理念中提炼预防性治理智慧,从徽州乡约族规里发掘基层治理经验,从徽州艺术中萃取美育教化资源,使传统文化基因转化为现代治理效能。这既是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的重要路径,更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创新实践。站在新的文明史高度,徽州文化研究应自觉承担起解码“第二个结合”机理、重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使命,在守正创新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东方智慧。

有利于推动安徽文化发展,提升安徽文化软实力

安徽是中华文明的策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其中又以徽州文化最为特殊。徽州文化有着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影响力。徽州文化的核心区虽然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但是其文化辐射区则包含了整个八皖大地,并且伴随着徽商、徽州籍官员的影响力扩散到中华大地的广大区域,甚至于远渡重洋,拓展了海外传播的路径。因此,徽州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国际传播能力,这与省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徽风皖韵独特魅力”的要求相契合。

徽州文化的连续性使得其具有鲜活性。徽州文化并非存在于口耳相传和考古挖掘中的传说文化、遗址文化,而是血脉、文脉始终传承至今的现实文化。作为古徽州核心区的黄山市,拥有2处世界遗产、2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街/村,最具代表性的如西递、宏村,早在本世纪之初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黄山市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不仅位列全省第一,更是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1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4项,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源;现存徽州典籍逾万部、仅家谱就数以千计,各类官方、民间文书更是超过了70万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安徽文化发展建设中“保护文化遗产”任务的基本盘,是“打造文化精品”任务的突破口,是“发展文化产业”任务的基石。

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力量之源,要传承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夯实徽州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发挥徽州文化的当代价值,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文化力量。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文化教研部,本文系2024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新安理学法思想与明代徽州乡约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